

# 終於可以出聲了

## 從於無聲處到社會主義悲劇

鍾雨

“於無聲處”一劇能在中國各地公開上演，其實也不簡單，在一些對中國前途早感失望的人事說，相信會引起一點刺激，令久已麻木的神經抖擻一下，投目再注視中國今後的變化，如果粗略地說“於無聲處”是現階段當權派的完全配合性懷柔文化手段，是難令人絕對信服的。我們之所以重視“於無聲處”的上演，著眼點放在兩處。

(一)這齣由上海工人業餘文藝愛好者創作並演出的話劇一出後，據說“全國已有二十多個省、市、區的文藝團體到上海學習和觀摩演出”。而“於無聲處”更由北京中央電視台轉播。北京工人日報又分別於十一月三日，六日全文刊出了全文，擴散面非常廣，不像是裝門面的做法。

(二)“於無聲處”的結局，出人意料地在一聲雷吼之後以“無聲”默默地收場（據外電介紹），這樣相對四人幫的三突出，結局時不是太陽剛出便是其他的前途光明的暗示，就好像表現了大多數中國人心中對中國前途的靜默和關心，結局好像告訴了我們，要中

國向前進，道路是曲折的，前途卻未必一定光明。以悲劇的擬象手法來增加舞台上的戲劇性張力，是建國以後罕見的戲劇（甚至是文學）的表現形式。

無論如何，“於無聲處”是我們對現政權寄以觀望的開端，如果快速推展四個現代化是從真正關心民瘼處作出發點，那麼，容忍“於無聲處”上演則希望是當權派真心開放政權的初步表現，不會曇花一現，又重行故我，施行毛澤東時代的專政手腕。我不知人的優點劣點能斬瓜切菜的分賬處理，不過，毛統治中國期間，卻有形無形，主客觀地鞏固了很多偏面，唯心，阻礙中國民主政治現代化的意識形態。香港左派的人士現在終於提出了「評毛才能前進」的論調了，可謂冰凍三日，又豈會是一日之寒。如果沒有過去的偏差，又何用今天的糾正和批判？其實揭露社會主義社會黑暗的文章，出現的歷史悠來已久。王實味寫了「野百合花」就被批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及托派，及至鳴放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內容要比“於無聲處”更徹底地針對制度本質的言論，文章，和大字報都不知出現過幾多次，可是每一次都被官方鎮壓下去。對毛統治時代的中共措施提出批評的，有幾許人能逃出被批為「封、資、修」大右流的厄運？官方的意見就籠統地以極粗糙的階級觀點將全數的批評意見打為右派，指出他們立場是資產階級的立場，故所鳴所放就不是「事實」。在過去十多二十年來，中共幹部之所以形成牢不可破的死硬教條主義傾向，毛澤東實在要負起大部份責任。毛澤東在一九四二年發表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時說了一段話：“刻畫資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畫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毛的講話在當時可能是特別針對某某人而發，但當毛思想在全國是定于一尊的時候，「對的是偉大的，錯的也是對的，整體是完美，局部亦是無疵的」這是千真萬確終於出現了的對毛澤東盲目崇拜的現象，在毛統治中國時，誰敢反對以上的提法？但毛遺留下來的客觀後果則可能是壞的比好的更多。毛的延安講話，理想主義色彩無可否認相當濃，有墮入從觀念出發批評事物的傾向，其最大的特點往往是方向性比分析性濃，正如鄧小平所說如果我們不全面，整體地去理解而將毛的思想付諸實踐，則教條主義肯定會產生。如果毛澤東理想中的社會主義就在眼前，我們生活其中而又再一廂情願地去製造很多和事實不符的謊言，則我們是真正在反社會主義的動。但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邁長過程中，不許人民呈現事實，指出矛盾（所可能出現的生產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個體與集體的矛盾，以至可能出現的官僚和群眾的矛盾），則是真真正正的機械論教條主義者。

鳴放期間，馮雪峯不是批評了當時中共領導下的文藝是“教條主義”“公式化”“概念化”和“沒有接觸到真實，只是表面的歌頌”嗎？吳祖光講得更徹底“甚至於在戲劇裡也難得看到心裡想說的話了”“文藝界真是一團漆黑”，“工作了會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結果馮雪峯和吳祖光的收場，正如其他人一樣，因作了工作被“一棍打死”。後四人幫的中國終於替以前鳴放的人“平反”“翻案”難道不是表示承認當時人民的批評是真確的和符合事實的嗎？將來中國應朝什麼方向走，如何走，是關心中國前程的人的大課題。在發展過程中，有兩點必需提出，作為免于重蹈覆轍的戒條。首先要指出，前四人幫的中國統治層，都普遍有嚴重教條主義傾向，他們徵用階級性和過渡性兩樣陳舊的東西來幫助對抗人民輿論。在過去，根據官方的詮釋，所有對時政的批評幾乎全部是反動階級所發，那麼工農兵無產階級的聲音那裡去了？生硬教條者就會演繹了以下邏輯：毛主席說：刻畫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必定渺小，中國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的革命黨，革命黨的黨員都革命，那麼批評黨的領導和措施，就應該是反革命。這樣照毛的教導學習，照他的語氣辦事，在四人幫當道時，又有誰敢批判上海工人出身的王洪文，說他“專橫墮落，殘害人民”（人民日報語）在當時批判無產階級出身的王洪文，必定渺小，必定被打為反革命（當然，如果，批判一些資產階級出身的領導人，後果是一樣的。）

當顯得陳舊的階級論不能全面指出問題核心，再不應是萬靈丹時，我們應當考慮到「新」的問題可能隨著新的經濟制度已經出現了。比喻說，新的經濟結構會否產生新的階級，他們可以通過掌握政治實權而躍居高位，脫離人民監管而成新的特權階級時，這種現象應是踰越舊資產階級社會而出現的，他們就有著性質的完全不同。當然，鞏固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是防止滋生特權階級的最有效方法，而在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概念未鞏固下來的今天，一切原則性的口號，方向性的談話都顯得無意義，什麼「為人民服務」不是喊了數十年，喊得甚囂塵上，可是，什麼是人民，誰才是人民，最後（亦是唯一）的詮釋者還不是掌權的人。人治的陰影不除，法治的根不長，在這期間（真正的由人治過渡到法治的期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可能本身已是目的，不應是手段。讓人民說話，百家鳴放，反映事實是唯一能保障反映真正現實的做法。毛的“延安文談”，原則性大於具體性，根本就沒有想像中的神奇，可以有板有眼的替「反映現實」定出一二三的有形步驟，可以蕭規曹隨。

下接62頁

在批判了庸俗偏面化了的階級決定論的同時，我們面對的是在中國未來發展的道路，我們要怎樣的去反映現實，為什麼要反映和反映什麼現實的問題。我們不需在這裡就中國國家性質的問題纏結下去，但想指出，中國現階段所呈現出來的社會現象，有二點和其他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很相似（一）現實不斷將人民分離疏隔（國內舊四人幫的消息封鎖，造成的遺害可能更大）（二）社會不斷一層一層地，縱的橫的結構化起來（隨著四個現代化的推展，這種情況會更明顯），完全的掌握現實，在現階級任何一個人來說，根本就不可能。人與人的溝通或團體與團體的真正意見交流，越來越虛浮，官和民的接觸，往往亦只有單向的由上而下，不同領域或結構系統中的不同冤情永遠無法互相呈現起來。所賴以作急需補救的，最原始的「輿論解放」就應該首先實行，輿論本身是個別群體的現象的表現，讓不同的領域內的現象首先呈現出來，才能邁向「最後真實」的目標，因為「很多個人的現象就是社會的現象」（C·W·MILLS）看現象才能求「真實」。這條原則放在文化領域中，就應該鼓吹各種不同的批判寫實主義，寫實在這時候，是為了要超越日常生活的狹隘的，浮淺的，習慣性的「現實」目的，是要擴潤和加深我們對「總」現實的掌握。「這些掌握，已不能通過單純的直接經驗來達致」（索奇著，香港與中國之間）

當然，由解放輿論導致的不同現象的呈現，是解答「什麼才是真實」的一種初步企圖，如果單靠輿論解放就能使中國前進，那「提」出的人和「相信」的人都只顯得幼稚而已。輿論解放本身並沒有神話的魔力，但卻如建屋，鋪路之要用三合土一般的「必要」。同樣地，認為開放輿論會導致政府解體的人，亦同樣地幼稚，他們通常有兩種特徵（一）他必然站在統治者的角度看事物（二）這個統治害怕人民的輿論，因為他不是一個革命的統治者。因此，要真正決定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現中國政權，就不能不警惕重墮入觀念的世界，做出和人民對立的事情來。鄧小平最近接見外賓說過“中央不同意大字報批判毛主席，但不擬阻止，因為這是人民的權利”。重視民權，是通往法治的開步。同樣地“於無聲處”一劇中歐陽平說：「……文化大革命中，看到黨內並不像自己想像中的那麼乾淨，看到黨內鬥爭曲折，複雜，就一下子驚慌失措，喪失信心……可是，如果什麼都那麼乾淨，那麼順當，還要我們入黨幹什麼……？」只希望歐陽平所說的也是每一個人民都看到的——現實根本就不是想像中的乾淨美好，要在每一時刻，敢言敢笑，敢怒敢罵，忠於現實，暴露和改造現實，為將來的光明鬥爭，中國才會真正向前進。

不要落後，立即加入為「文化新潮」訂戶：填上表格  
連同支票請寄：灣仔謝菲道215—225號仁英大廈2F座  
「文化新潮社」收或交一山書屋（譚臣道110號閣樓）。

姓名：\_\_\_\_\_

地址：\_\_\_\_\_

電話：\_\_\_\_\_ 日期：\_\_\_\_\_

\* 支票請寫「文化新潮社」訂閱費本港全年十二期港幣三十元。

\* 海外平郵全年港幣五十五元或美金十二元。海外空郵全年港幣一百四十元或美金三十元正。



害怕也沒用，你必須作好準備，因為新文化人已經到臨！